

《星期评论》对社会主义的认知与宣传

杨宏雨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五四时期,各种西方思潮涌入中国,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社会主义成为五四时期“强有力的社会思潮”,以致时人有“不谈社会主义,则不足以称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的感慨。《星期评论》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反抗资本主义、追求理想社会的世界性的时代精神和社会运动,积极宣传包括马克思主义和布尔塞维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想,并提出中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道路需要同各国的历史、国情相结合等见解。《星期评论》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想一视同仁,均持研究与批评的态度,其设想的社会主义道路本质上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但在当时,它对中国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仍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关键词]《星期评论》;世界的时代精神;反抗资本主义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2.10.017

五四时期,各种西方思想风起云涌进入中国。在“300 多种的主义”^[1]中,“社会主义”成为当时中国人的最爱。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并不特指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1924 年,英国社会学家 D·F·格里菲思出版了一本名为《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论文集,就汇集了 260 多种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此后,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的发展,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又增加了一倍,有人统计至今已达 500 多种。”^[2]五四时期,国人口中的社会主义一词是个很宽泛的概念,包括多种社会主义思潮,但现今不少学者在学术研究中有意无意地把社会主义等同于马克思主义,^[3]造成了一些偏颇之

论。有鉴于此,笔者以《星期评论》为对象,讨论五四时期国人对社会主义的认知,略窥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潮之一斑。

一、“主义”满天飞:什么主义都有人谈

“主义”并不是一个外来词,在《逸周书》中已经有了“主义”一词:“主义行德曰元”(《逸周书·谥法解》),但这里的“主义”是以义为主,谨守仁义的意思,与现代汉语中的“主义”完全不同。与现代汉语中“主义”一词稍微接近的是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用法:“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不顾其身”,这里的主义作“主张”讲。现代汉语中的各种主义,可以看作这一用法

的延伸或衍生。

“主义”尽管不是一个外来词,但其在近现代的大规模使用,实际上是西学东渐的产物。现代汉语中的“主义”是对英文词缀“ism”的翻译,一般可以解释为对于经济、政治、社会和学术等问题所持的系统理论与主张。日本学者陈力卫研究发现,日本在19世纪80年代开始用“主义”翻译英文词缀“ism”;戊戌变法失败后,随着康、梁等维新志士流亡日本和中国留日潮的兴起,各种“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文章和言谈中开始流行。^[4]

从甲午战败到五四运动是中国社会急剧变动的时代,同时也是中国社会急剧融入世界、与世界接轨的时代。在新文化运动的猛烈推进下,五四时期,中国是“主义”满天飞,用时人的话来说:“甚么主义都有人谈”,^[5]以致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大声疾呼“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6]欲为当时的“主义热”降温、醒脑。

《星期评论》是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创办的以宣传新文化、新思潮,倡导社会主义为主旨的刊物,五四时期的“主义热”在该刊上有淋漓尽致的反映。

根据笔者的统计,《星期评论》上共出现“主义”一词1416次。该刊共出版54号(正刊53号,外加“双十纪念号”)76张,平均每张上出现“主义”一词达18.6次。在54号76张《星期评论》上,除第13号、第38号、双十纪念号第5张、第39号第3张、第48号第6张、第48号第9张(共六张)未出现“主义”一词外,其余每号每张都有。“主义”一词出现频次大于等于40次以上的有9号9张,文章篇名上含有“主义”一词的达12篇。

表1是笔者整理的《星期评论》上出现“主义”一词的情况,为了统计上的方便,把文中“主义”之前没有前缀和一些明显与“主张”同义的去掉,剩余1113次,涉及217个包含“主义”的概念。

表1 《星期评论》中的各种主义

名词	次数	名词	次数	名词	次数	名词	次数
社会主义	243	共和主义	3	超人主义	1	利我主义	1
军国主义	61	古典主义	3	彻底的现实主义	1	利用主义	1
资本主义	52	基督教救国主义	3	出世主义	1	联邦国家主义	1
共产主义	33	几尔德社会主义	3	大家庭主义	1	两不主义	1
无政府主义	33	近代国家主义	3	大兼并主义	1	马尔萨斯主义	1
国家主义	32	科学的社会主义	3	大同的主义	1	民本主义	1
帝国主义	29	劳农主义	3	单一国家主义	1	民族自决主义	1
马克思主义 ^[7]	25	满恰斯塔主义 ^[8]	3	单一主义	1	男权主义	1
人道主义	23	名分主义	3	敌本主义	1	男统主义	1
子孙主义	23	平和主义	3	独善其身主义	1	偏狭主义	1
理想主义	21	特权主义	3	多数主义	1	平衡主义	1
珊地加利主义	20	安那其主义 ^[9]	3	法兰西的平等主义	1	强硬主义	1
过激主义	19	稳和主义	3	泛德意志主义	1	酋长主义	1
布尔塞维主义 ^[10]	17	协作共享主义	3	泛德主义	1	全人类社会主义	1
民主主义	14	政治的民主主义	3	泛劳动主义	1	人民社会主义	1
物质主义	13	资本侵略主义	3	泛斯拉夫主义	1	人治主义	1
自由主义	12	§主义	2	非调和主义	1	人种改良主义	1
集产主义	10	爱国主义	2	非军主义	1	肉欲主义	1
军国主义	10	北美珊地加利主义 ^[11]	2	福命主义	1	人阁主义	1
民治主义	10	博爱主义	2	改良主义	1	弱肉强食的主义	1
实验主义	10	反动主义	2	改造主义	1	三不主义	1

名词	次数	名词	次数	名词	次数	名词	次数
世界主义	10	放任主义	2	隔离主义	1	商业主义	1
革命主义	9	非军备主义	2	个人主义	1	社会改良主义	1
互助主义 ^[12]	7	非战主义	2	工读互助主义	1	世界民主主义	1
民权主义	7	国粹主义	2	工行社会主义	1	世界和平主义	1
民生主义	7	国权主义	2	工业联合会的主义	1	世界侵略主义	1
社会民主主义	7	和平主义	2	工业主义	1	熟练工组合主义	1
武力主义	7	急进主义	2	共同劳动主义	1	他律主义	1
修正主义	7	救国主义	2	官僚主义	1	妥协主义	1
产业民主主义	7 ^[13]	美利坚珊地加利主义	2	惯习主义	1	乌托邦的社会主义	1
工团主义	6	劳动组合主义	2	光复主义	1	狭小个人主义	1
家族主义	6	门罗主义	2	国家社会主义	1	相互扶助的主义	1
三民主义	6	人类平等主义 ^[14]	2	还债主义	1	相互主义	1
贤母良妻主义	6	三益主义	2	基督教根本主义	1	消极主义	1
议会主义	6	社会共产主义	2	羈縻主义	1	新绅士主义	1
I. W. W. 主义 ^[15]	5	十四条主义	2	极端干涉主义	1	形式主义	1
平民主义	5	惟我主义	2	极端现实主义	1	修正派社会主义	1
侵略主义	5	未来主义	2	极端纵欲主义	1	一民主义	1
他力主义	5	无政府共产主义	2	阶级的战争主义	1	议会政治主义	1
同胞主义	5	武力的经济的侵略主义	2	阶级主义	1	真实的主义	1
大什么主义	4	专制主义	2	不割地不赔偿的主义	1	政治的经济的侵略主义	1
黷武主义	4	资本的帝国主义	2	洁身自好的主义	1	制欲主义	1
极端禁欲主义	4	资本家主义	2	解放主义	1	资本的经济主义	1
禁欲主义	4	自由联合主义	2	进步主义	1	资本专制主义	1
民族主义	4	自由贸易主义	2	进化主义	1	自杀主义	1
平等主义	4	组合主义	2	经济侵略主义	1	自由共产的主义	1
强权主义	4	八时主义	1	竞争主义	1	自由共同主义	1
上海主义	4	半工半读主义	1	军阀主义	1	自由合同主义	1
虚无主义	4	报施主义	1	军国侵略主义	1	自由竞争主义	1
中央集权主义	4	闭关主义	1	君主社会主义	1	自由平等博爱主义	1
温情主义	4	不传种的主义	1	开明专制主义	1	自由平等主义	1
保守主义	3	节烈主义	1	劳工组合主义	1	组合社会主义	1
帝政主义	3	产业本位组合主义	1	劳工革命主义	1		
独身主义	3	产业的组合主义	1	立宪主义	1		
泛日耳曼主义	3	祖宗同乡主义	1	利己主义	1		

仔细考察这 217 个概念,可以发现:(1)当时国际上流行的概念,如社会主义、军国主义、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等,中国都有人在谈论、研究。(2)中国人除了贩卖国际上流行的概念,还自创了不少新的主义,如沈玄庐把一些中国人极端重视家族的延续的理念,称为“子孙主义”;戴季陶把上海资本家注重发财、精于算计的精神称为“上海主义”等等。(3)当时人们还使用两个概

念叠加组合成一个主义,形成某些概念,用来讨论问题。如“社会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 + 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 + 民主主义”。类似的用法还有不少,此处不一一列举。(4)有的直接使用英文单词发音后面加主义,如“布尔塞维主义”“珊地加利主义”等,甚至使用美元符号“\$”后面加“主义”,构成“\$主义”。这些创造,解决了不少翻译上的麻烦。(5)为适

应论说中的需要,不少人使用“名词或动词+的+主义”构成新词汇,如“L. W. W. 的主义”“大同的主义”“工业联合会的主义”“洁身自好的主义”等。(6)在XX主义前再加上定语,表达与原有名词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如“产业的民主主义”“政治的民主主义”“产业的组合主义”等。

综上,五四时期中国人不仅大量使用“主义”一词,而且已经能熟练地、灵活地、创造性地使用这一词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认识。

二、不谈社会主义,则不足以称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

社会主义一词源于古拉丁文 *socialis*,意为“同伴的”“同伙的”“同盟的”。根据一些学者的考证,在西方,社会主义一词的含义有一个逐步变迁的过程。最早使用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是德国神学家、天主教本尼迪克派教士安塞尔姆·德辛。1753年,他在“与人论战时使用了‘社会主义’一词,当时主要的意思是指人的社会性而言”。^[16]19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主义一词的现代用法在英国和法国出现。1822年,英国爱德华·科珀在和罗伯特·欧文的通信中,第一次以英文使用“社会主义”这个术语。^[17]接着,1827年,罗伯特·欧文的信徒主办的《合作杂志》上,有文章使用“社会主义者”一词来称呼当时欧文合作学说的信奉者。^[18]1833年,欧文派的信徒在《贫民卫报》上使用了“社会主义”一词,这是英国首次在报刊上公开使用该名词。1834年,法国圣西门派的著名活动家埃尔·勒鲁发表《论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一文。他根据圣西门的学说,第一次对“社会主义”一词作了比较充分的阐述。他认为只有走“联合”或“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改善人口众多的贫困人民群众的命运,“从而使‘社会主义’一词第一次成了表达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19]霍布斯鲍姆指出:“在19世纪,从逻辑上看,似乎完全可以说,个人主义社会的核心就是竞争,也就是市场,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就必须是合作和团结。这就使社会主义有了各种可能性,从为了社会利益而对

自由放任经济作些许修正,到彻底废除私有制的共产主义实验,都可以归之于社会主义。”^[20]在这种思想逻辑下,19世纪30年代,社会主义一词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和否定物,首先在英法等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流行起来,接着向整个欧洲扩展、蔓延。“到了19世纪40年代初,‘社会主义’一词已经盛行于西欧各国的书刊之中,成为一种十分时髦的新思潮。”1840年,德国资本主义还非常落后,但当时的《德意志季刊》上也有文章谈论“社会主义”。^[21]

随着人类现代化的进程从西欧发源并向世界各地蔓延,社会主义一词也从西欧国家传入到日本、中国等地。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日本无疑是第二波现代化浪潮中的佼佼者。19世纪80年代,日本的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初步的发展,1880年以后,日本的对外贸易形势出现了好转,“从历来的逆差变成顺差”。^[22]1885年,日本第二产业的产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23]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的产业工人人数不断增加,截至1886年,日本共有工人193940人。与此同时,日本工会组织初步萌芽,并开始出现工人运动。^[24]在此背景下,社会主义思想摆脱了明治初期刚抵日本时遭受的冷遇,“社会主义的发展之路有所改观”,“开始逐渐涌现出具有社会主义早期倾向或类似社会主义主张的理解者。”1870年,日本学者加藤弘之在《真正政府的原理》一书中首次使用日文“社会主义”一词。1878年6月6日,福地原一郎在《东京每日新闻》上发表《邪说之危害》,首次用汉字译出“社会主义”一词。1887年以后,随着日本“社会现状的改变和社会主义的传播积累”,社会主义一词在日本广泛流行起来。^[25]

汉语中的社会主义一词是从日文传播过来的。中国的早期现代化运动虽然起步不晚于日本,但由于国内守旧势力过于强大,致使中国的现代化步履蹒跚,进展异常缓慢。1894年,中日之间爆发了一场决定此后数十年国运的战争——甲午战争。甲午之战的惨败,一方面加剧

了中国的民族危机,另一方面也给中国现代化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即“师日维新”。为了救亡,中国的有识之士提出“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26]的口号,大批中国人赴日留学,希望从日本寻觅到富国强兵的真经。随着“师日维新”运动对日本的关注加强和中国留日学生的增多,“社会主义”一词也从日本传入中国。1896年11月25日,《时务报》刊载日本学者古城贞吉译的《硕儒诂音》,文中称英国社会主义活动家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为“近世社会主义之泰山北斗”。康、梁等维新志士流亡日本后,企图保光绪复辟,东山再起;孙中山在日本宣传革命,企图推翻满清专制统治。双方的宗旨虽然差别很大,但受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思潮影响,都竞相提倡社会主义。梁启超相信:“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27]并先后写出了《中国之社会主义》(1904年)、《〈社会主义论〉序》(1907年)等文,对社会主义加以宣传。孙中山宣称,社会主义是自己“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28]他耳闻目睹欧美、日本等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后带来的贫富分化和其他一些社会问题,把社会主义的精神融入自己的革命思想中,创立民生主义学说,希望中国能未雨绸缪,通过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大措施,“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29]既实现经济发展,又达到经济平等,让中国一步进入社会主义的天堂。在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共同努力下,20世纪初年,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一度热气腾腾”。^[30]

“俄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事件之一。”^[31]“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32]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了“西方的

没落”,那么十月革命则宣告了“社会主义”的兴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1910年前后一度趋于沉寂的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又空前活跃起来。据杨奎松等人统计,“在1918年以前的大约20年左右的时间里,曾经发表过介绍和同情社会主义主张的文章(包括译文在内)的报刊,不足30种,占这一阶段出版的260余种社会科学类重要报刊的约11%,然而,在1918年至1922年前后5年多的时间里,发表过介绍和同情社会主义的文章的报刊多达220余种,占这一时期出版的280余种重要的社会科学类杂志及报纸的将近80%。”^[33]当时舆论界的状况,大有“不谈社会主义,则不足以称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的气概”。^[34]

社会主义是五四时期期刊的热门话题,这在《星期评论》上得到了很好的印证。从表1可以看出,社会主义一词在《星期评论》中出现频次最多,达257次,是排名第二的军国主义一词的4.2倍以上。从表2可以看出:(1)《星期评论》上共有60篇文章提及过“社会主义”这一词,占该刊全面文章篇目(490篇)的12.24%以上。(2)《星期评论》上共有34号45张出现过“社会主义”一词。从号数上看,占全部总号数(54号)的62.96%以上;从张数上看,占全部总张数(76张)的59.2%。(3)从作者和译者看,在《星期评论》上提及社会主义一词的作者或译者有T. T. S.、李汉俊(汉俊、先进)、季龙、季陶、李大钊、颂西、徐苏中、玄庐、云陔、哲父、仲九等11人,占该刊全部署名作者(52人)的21.15%以上。(4)戴季陶在33篇著译中,使用社会主义一词118次,是《星期评论》上谈论社会主义最多的人;李汉俊(汉俊和先进两个笔名)在11篇著译中,使用社会主义一词84次,排名第二。

表2 《星期评论》上社会主义一词出现情况

作者	篇目	次数	期号	日期
季陶	国际同盟和劳动问题	1	第2号	1919年6月15日
季陶	白乐天的社会文学	2	第4号	1919年6月29日
皮尔逊著,季陶译	社会主义与两性问题(上)	9	第5号	1919年7月6日

作者	篇目	次数	期号	日期
季陶	日德俄联盟论	1	第6号	1919年7月13日
皮尔逊著,季陶译	社会主义与两性问题(中)	6	第6号	1919年7月13日
季陶	救国储金拿来做什么?	1	第7号	1919年7月20日
皮尔逊著,季陶译	社会主义与两性问题(下)	5	第7号	1919年7月20日
季陶	女子解放从哪里做起(其六)	2	第8号	1919年7月27日
季陶译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纲	1	第10号	1919年8月10日
季陶	孝慈	1	第10号	1919年8月10日
季陶	“世界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的适应”	9 ^[35]	第17号	1919年9月28日
季陶	联合国对俄政策的变动——日本究竟怎么样?	1	第17号	1919年9月28日
云咳	唯物史观的解释	3	双十纪念号第1张	1919年10月10日
季陶	英国的劳动组合	15 ^[36]	双十纪念号第3张	1919年10月10日
季龙	宗教的共和观	1	双十纪念号第4张	1919年10月10日
季陶	旧伦理的崩坏与新伦理的建设(上)	2	第20号	1919年10月19日
云咳	唯物史观的解释(续纪念号)	3	第20号	1919年10月19日
季陶	美国产业界的大恐慌	4	第21号	1919年10月26日
先进	调和者与神经病	1	第21号	1919年10月26日
山川菊荣著,季陶译	现代女子问题的意义	2	第23号	1919年11月9日
季陶	改造日本的奇论	2	第23号	1919年11月9日
先进	I. W. W. 的沿革	1	第24号	1919年11月16日
季陶	意大利的“赤色化”与其反动	5	第28号	1919年12月14日
加宾特尔原著,堺枯川转述,哲父译	自由社会的男女关系(一)	4	第28号	1919年12月14日
季陶	欢迎“闽星”	1	第28号	1919年12月14日
玄庐	介绍“工读互助团”	1	第29号	1919年12月21日
李大钊	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	3	第31号第1张	1920年1月3日
威廉·里布列希著,季陶译、注	马克思传	12	第31号第2张	1920年1月3日
T. T. S.	马克思逸话一节	1	第31号第2张	1920年1月3日
徐苏中	劳动会议与特殊国	1	第31号第3张	1920年1月3日
季陶	新年告商界诸君	1	第32号	1920年1月11日
北泽新次郎著,汉俊译、注	I. W. W. 概要	6	第33号	1920年1月18日
季陶	美国的劳动党	3	第33号	1920年1月18日
季陶	“萨波达举”的研究	4	第34号第1张	1920年1月25日
先进	美国与“社会党镇压令”	1	第34号第2张	1920年1月25日
先进	森户助教授问题与日本舆论界	2	第35号	1920年2月1日
季陶	劳农政府治下的俄国	5	第39号第1张	1920年2月29日
颂西译	谁能恢复世界的秩序?	5	第40号	1920年3月7日
季陶	劳动运动的发生及其归趣	1	第41号第1张	1920年3月14日
季陶	日本众议院解散的结果如何?	2	第41号第1张	1920年3月14日
克鲁泡特金著,苏中译	国家论(六)	1	第41号第2张	1920年3月14日
克鲁泡特金著,苏中译、跋	国家论(七)	11	第42号	1920年3月21日
季陶	德国革命的因果	9	第43号	1920年3月28日

作者	篇目	次数	期号	日期
季陶	俄国劳农政府通告的真义	2	第 45 号	1920 年 4 月 11 日
仲九	为什么要赞同俄国劳农政府的通告?	1	第 45 号	1920 年 4 月 11 日
汉俊译、注	强盗阶级 (the Robber Caste)	3	第 46 号	1920 年 4 月 18 日
季陶	国家主义之破产与社会的革命	3	第 47 号	1920 年 4 月 25 日
李大钊	“五一”May Day 运动史	2	第 48 号第 1 张	1920 年 5 月 1 日
季陶	文化运动与劳动运动	1	第 48 号第 2 张	1920 年 5 月 1 日
季陶	上海的同盟罢工	1	第 48 号第 3 张	1920 年 5 月 1 日
季陶	关于劳动问题的杂感(一)	3	第 48 号第 4 张	1920 年 5 月 1 日
森户辰南著,苏中译	国际劳动问题的现势	14	第 48 号第 5 张	1920 年 5 月 1 日
季陶	关于劳动问题的杂感(二)	1	第 48 号第 5 张	1920 年 5 月 1 日
J. Lizerovisteb 著,汉俊译	五一	1	第 48 号第 8 张	1920 年 5 月 1 日
颂西译	俄罗斯社会党联邦苏域共和国新纪元两年的故事	2	第 49 号	1920 年 5 月 9 日
汉俊	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	25	第 50 号	1920 年 5 月 16 日
汉俊	劳动者与“国际运动”(上)	12	第 51 号	1920 年 5 月 23 日
汉俊	劳动者与“国际运动”(中)	8	第 52 号	1920 年 5 月 30 日
汉俊	劳动者与“国际运动”(下)	24	第 53 号	1920 年 6 月 6 日
本社同人	《星期评论》刊行中止的宣言	4	第 53 号	1920 年 6 月 6 日

五四时期,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热烈欢迎不仅表现在报刊杂志上。1923年,在北大25周年纪念日举行的有各界民众参加的民意测验中,信奉社会主义者以291票名列榜首,差不多是排名第二的信奉三民主义的2倍(三民主义得票153张)。^[37]冯自由说:“现在社会主义的一句话,在中国却算是最时髦的名词了。”^[38]这说明,五四时期,社会主义“确实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社会思潮,以其不可抗拒的影响力影响了中国”。^[39]

三、社会主义,其概说既广,学派亦甚复杂

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民国初年,孙中山就说:“社会主义之名词,发于十九世纪之初,其概说既广,其定义自难。”^[40]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在回复褚葆衡希望《新青年》能多倡导社会主义的来信中说:“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41]《星期评论》的同人也一致认为,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具有难言的复杂性。戴季陶说社会共产主义“系统不清”,^[42]“不是一个严格的主义”;^[43]李大钊说:“社会主义一语,有很

多的解释”;^[44]李汉俊也承认:社会主义“内容复杂,不能像别的主义,下严格的定义”。^[45]

五四社会主义思潮的复杂性,在《星期评论》上有着充分的反映。在表1中,除了社会主义这一名词以外,其余与社会主义思潮有关的概念还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珊地加利主义、过激主义、布尔塞维主义等46个,加上几尔德社会主义、科学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10个含“社会主义”的名词,共有各种社会主义概念56个。

五四时期传入中国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不仅名目繁多,而且人们对这些思潮和概念的认识也和今天有一定的差别。下面我们就看看五四时期《星期评论》的作者们对这些概念和思潮的认知。

1. 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一词来源于古拉丁文 Communis,意为公有。20世纪初,该词由日本传入中国,1903年前后,已有多人使用。《星期评论》上共出现共产主义37次(共产主义33次、社会共产主义2次、无政府共产主义2次)。从《星期评论》看,当时的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的

认知主要有:(1)它和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多数主义等多种西方学说一样,是需要中国人认真研究的新思想、新思潮。^[46](2)在一些新思潮的反对者口中,它是无政府主义和过激主义的同义词。^[47](3)指“乌托邦主义”。李大钊在《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一文中把从欧洲大陆传入美利坚的社会主义分为两大派,“一是乌托邦派;一是历史派。”李大钊在文章中把乌托邦派的理想和信仰称为共产主义,用历史派称呼马克思主义者。^[48](4)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的劳农政府对自己信仰的主义和所实行的政策的自称。^[49](5)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都自称为共产主义者”。^[50](6)即“互助主义”。施存统在《“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一文中,称工读互助的实验为“试验共产”,把共同劳动、互相帮助的互助主义称为共产主义。^[51]

2. 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一词,是从古希腊文 Anarchia 演化而来的,它的原意是“无权力、无秩序的状态”。《星期评论》共出现无政府主义41次,除无政府主义一词(33次)外,还有虚无主义(4次)、安那其主义(3次)、阿拉奇士姆(1次)。从《星期评论》看,当时的知识分子对它的看法有:(1)是中国人需要研究的新思想、新思潮。^[52](2)在一些新思潮的反对者口中,它是共产主义和过激主义的同义词。^[53](3)在社会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既相互合作,也尖锐对立。^[54](4)一个由政治的压制专横所激成之社会的急进主义。^[55](5)十月革命后,俄国劳农政府在俄国信奉和推行的主张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无政府主义。^[56]

3. 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对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社会主义学说的简称。《星期评论》提及马克思216次、恩格斯34次、马克思主义25次。《星期评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包括:(1)中国劳动运动中需要多加研究的新思想、新思潮。^[57](2)在一些新思潮的反对者看来,它和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一样,都属于需要严加禁止的过激主义。^[58](3)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

唯物史观基础上的,^[59]是“科学的社会主义”。^[60](3)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影响很大,“有许多时候,好像说起社会主义,就是指马克思主义,讲马克思主义,就无异是说社会主义”。^[61](4)马克思主义需要与各国的国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是世界的不是国家的”,但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都有自己的特点,“这就是各民族历史的精神及现代境遇不同的结果”。^[62](5)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都主张推翻现存的资产阶级的统治,但双方在如何建设未来社会有着原则的分歧,“马克思派说:由‘综合的财产’与‘共同劳动生产组织’而成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如果没有万能的中央政权,一定是不能建设、不能维持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只要有绝对的统治权的东西,皆不准它存在。”他们“只希望以劳动者底群众或团体的共产组织占有财产,实施生产。但是这个团体,是不能用社会的或政治的强制使他集合的,是要他们自由任意集合的”。^[63](6)马克思的学说既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无政府主义,而是集产主义。^[64]

4. 珊地加利主义。珊地加利主义是对 Syndicalism(工团主义)的英译。在《星期评论》介绍珊地加利主义的主要是李汉俊。《星期评论》共出现工团主义6次,珊地加利主义24次(包括珊地加利主义20次,北美珊地加利主义2次,美利坚珊地加利主义2次)。《星期评论》对珊地加利主义的主要看法有:(1)在法国、意大利流行的一种社会主义思潮,著名的代表人物有法国的梭列尔。^[65](2)在欧洲大陆流行的珊地加利主义传入美国以后,“忠实遵奉”法兰西、意大利珊地加利主义的团体“北美的珊地加利主义者同盟”“会员很少,势力亦极微”。真正在美国活跃的有影响的社会主义团体是 I. W. W. (The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的缩写),即“世界产业劳动者同盟”。该组织因其政治主张与欧洲大陆的珊地加利主义有不少“共鸣”之处,常被人称为“美利坚珊地加利主义”。但事实上,两者之间

“直接的关系是决没有的”，并且“在主张上以及手段上”都有不少明显的差异。^[66]

5. 过激主义与急进主义。《星期评论》上共出现过激主义 19 次，急进主义 2 次。急进主义是过激主义的同义词，意为主张用激烈的手段变革现存的社会。^[67]在《星期评论》上，过激主义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布尔塞维克主义。十月革命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人在俄国推行了一系列激烈的社会变革政策，被各国的反对者称为过激派和过激主义。^[68]二是指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社会主义学说。当时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流行引起了当局和一些保守人士的恐惧，他们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等社会主义学说不加区分，一律称为过激主义，用法令禁止宣传。^[69]

6. 布尔塞维主义和劳农主义。《星期评论》上共出现布尔塞维主义 17 次，劳农主义 3 次。《星期评论》上对布尔塞维主义的主要认识有：(1) 布尔什维克是俄国社会党中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多数派，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也不是过激派。戴季陶说：“‘布尔色’是多数的意思，‘免色’就是少数的意思。”^[70]俄国的布尔塞维克，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其政治主张，“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张，相去不可以道里计”。^[71](2) 布尔什维克是一个言行一致的社会主义政党。“布尔色维克的政策是纯粹的社会党政策。他们的主义，像社会主义一样，在全世界已经传布了多年了。”但是他们不像别的政党那样，为了选票而去宣传他们的主义，“他们是真的要把他们的理论在适当时便去实行的。”十月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立即兑现了他们的承诺。^[72](3) 布尔塞维主义产生的原因是俄国的专制政治。“从前的俄国，是个极专制的国”，布尔塞维克“是从不平两个字里面涌现起的怒潮”。^[73](4) 布尔塞维主义的革命是“在世界主义的下面，以一国家固有的范围为起点的革命，并不是在国家主义的下面，以一国家为单位的革命。”^[74]布尔塞维主义感染力极强，世界各国统治者都很害怕它。他们联合起

来，企图剿灭布尔什维克。^[75](5) 布尔塞维主义破坏性极大，“是和人道目的冲突的”，中国应该未雨绸缪，走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防止出现类似俄国的社会动荡。^[76]

十月革命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推行了一系列旨在保护工农利益的政策，所以当时的俄国政府被人称为劳农政府，他们的主张和措施又被称为劳农主义。^[77]

7. 集产主义。集产主义一词今日不常用，但在五四时期曾是颇为活跃的一种社会主义思潮。金观涛、刘青峰在《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的附录二“百个现代政治术语词意汇编”中把它解释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张”，^[78]显然有些简单化。1919 年 11 月，杨匏安在《广东中华新报》上介绍说：“集产主义者，主张不动产及一切生产机关，尽归之社会公有、或国家公有之学说也。纯粹之集产主义，与共产主义颇异其趣。共产主义于生产之分配主张绝对平等。惟集产主义不然，其分配一以各人劳动为准，以平允的方法而谋社会之改良。此实为近世社会主义者之根本的思想。”^[79]唐钺、朱经农、高觉敷在 1930 年主编的《教育大辞书》写道：“集产主义，为关于社会主义实现方法之一种见解，此种见解，是欲将一切生产手段如工场、银行、土地、矿产、交通机关等等，作为国家或地方团体之公有；至于消费用品，则仍维持私有制度。”^[80]1935 年，《新中华》杂志上对集产主义的解释与《教育大辞书》的解释大体相同。^[81]集产主义一词在《星期评论》上出现 10 次，相关看法有：(1)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集产主义；^[82](2) 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推行的政策和措施是马克思的学说，是一种集产主义，“并不是共产主义”。^[83]

8. 互助主义。五四时期，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在中国影响很大，《星期评论》高度称颂克鲁泡特金，把他和罗斯金、马克思并列，称其为“大学问家”“先觉”，赞扬他们发明了“互助”“这种造福世界的主义”。^[84]《星期评论》从第 36 号开始，连续 7 号刊载由徐苏中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

《国家论》，并先后在13篇文章中合计提及克鲁泡特金20次。该刊共出现“互助”一词达260次之多(超过“社会主义”的出现频次)。^[85]据估计,该刊上宣传互助思想的文章总字数应不在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之下。

《星期评论》上共出现互助主义8次(互助主义6次、互助的主义1次、工读互助主义1次),结合该刊上对互助一词的使用,可以发现,当时该刊上对互助主义的认知主要有:(1)互助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新潮流。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人类猛醒过来,“感受互相争夺、杀戮欺凌的痛苦”,世界思潮“竟涌现了一个‘互助’的真理”。^[86](2)互助论是对达尔文进化学说中有失偏颇之处的纠偏,是“科学的进化公例”。互助主义是建立在科学的进化论基础上的科学理论。^[87](3)互助主义是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推进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理论。^[88](4)工读互助,“一面劳力,一面劳心”,可以使“身体平均发达”,是真正“人的生活”。^[89]

9. 社会民主主义。《星期评论》共出现社会民主主义一词7次,当时该刊对该词的主要理解有:(1)社会民主主义是自由和平等的结合,是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合,^[90]主张在民主政治下,用和平的手段推行社会主义政策,解决贫富悬殊和劳资对立问题。^[91](2)第二国际期间,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大多冠名为社会民主党,他们的政治主张被称为社会民主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当时的影响最大。^[92]

10. 修正主义。《星期评论》共出现修正主义一词7次。当时该刊对该词的主要认知为:修正派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一个派别。189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之后党内发生分化,“发生了‘修正派’和斯巴达加斯团”。^[93]修正主义就是对修正派的政治主张的概括。对修正主义,《星期评论》引用修正派代表人物伯恩斯坦的话解释说:“德国的社会党当中,并不是有一个修正派名称的政党。修正派也并不是有精密界限的学说及政纲。……

修正主义这一句话,不过是要求变更,至于怎么样变更法,也就是没有明白限定的。但是这一个倾向是已经很明了的。总而言之,修正主义就是要把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实际在进化的意义上,使他发展。”^[94]总的看来,《星期评论》把修正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分支。

11. 产业民主主义。《星期评论》上共出现产业民主主义7次。产业民主主义的目标是“适应民主的理想”,改造资本主义私人独占生产资料的经济制度,保障劳动者“经济的权利及自由”。其基本方法是在企业内部让劳动者“参预产业的直接管理”,在外部,“由政治活动(指立法、行政干预等手段——引者),来强制产业,指挥产业”朝着有利于保障劳动者和社会利益的方向发展。^[95]

12. I. W. W. 主义。在《星期评论》上介绍 I. W. W. 主义的主要是李汉俊。该刊对 I. W. W. 主义的介绍主要有:(1)I. W. W. 是对 The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的缩写,汉语应译为“世界产业劳动者同盟”。(2)I. W. W. 是美国阶级斗争和社会进化的产物,“以革命的手段图劳动者阶级的解放”是其基本政治主张。(3)I. W. W. 的精神是革命,它“把社会严密的区别为资本家与无产者二阶级”,强调资本家是劳动者不共戴天的仇敌。“现在社会的正义、自由、权利,在劳动者,都不过空虚的名词。所以劳动者不能不用一切革命的方法,图破坏现在社会组织。”I. W. W. 反对议会斗争,主张“以直接行动为实行手段,以图资本主义之破灭”。^[96]

13. 几尔德社会主义。一种流行于英国的社会主义思潮。在《星期评论》介绍几尔德社会主义的主要是戴季陶。几尔德社会主义在《星期评论》上出现3次。该刊对几尔德社会主义的介绍主要有:(1)几尔德(Guild)这个词,“是由中世纪‘同业组合’(Guild)的意思借用而来的”。(2)几尔德社会主义的首倡者是俄列斯基(A. B. Orage)。(3)几尔德社会主义主张从事同一产业的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集合起来,组织一个

全国的几尔德”，各种产业，“各自以民主的方法，管理他本业的几尔德”，然后在此基础上联合起来，管理社会的公共事务，“以免除为生产者牺牲消费者利益的危险”。^[97]

对于《星期评论》出现频次仅1—2次的一些社会主义概念，在此略过，不一一介绍。

《星期评论》上介绍的社会主义思潮很多，该刊秉持平等研究的原则——“不研究，便没有真的认识。”^[98]“文化的进步，只有从研究批评可以得来，盲从和武断，都是阻碍文化进步的”^[99]——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态度基本上是一碗水端平，这在戴季陶的下一段话体现得最明显：

我对于社会主义，希望中国人多研究以马克思经济学为骨干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更希望大家研究英国的劳动组合，法国的劳动总同盟，美国的 I. W. W 等具体的组织。至于俄国波尔色维克的建设，在政治组织上和经济组织上，是很切实的模范，我们尤其不能不切实研究。以上几种都可以作我们理论和实际的根据，至若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我们尽管可以研究，并且必须研究，在伦理思想的趋向上也很可以给我们许多暗示。可是，在这些思想还没有脱离思想的形式，具备一个科学的组织的时候，我们拿来作实际宣传的资料，实在很不相宜的。^[100]

这种对各类新思潮一视同仁的研究的态度，有利于新思潮的活跃与传播，有利于人们从比较、鉴别中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新路。

四、社会主义：反抗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时代精神与社会运动

虽然《星期评论》上介绍的社会主义思潮和流派很复杂，《星期评论》的同人们也认同社会主义的复杂性，但作为五四时期舆论界的明星和当时宣传社会主义的先锋，该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作出了不少的探索。

在《星期评论》上，戴季陶提出的社会主义

为“世界的时代精神”说，是一个新颖的、颇有创意的提法：

“社会主义”这个主义……并不是一个严格的主义，只是一个世界的时代精神。这一个时代精神，是普遍的照住全世界。全世界的民族，各有各的历史的精神，各有各的现在境遇，于是便各有各所理想的世界。这各民族特殊的质性，在世界的时代精神笼罩下面，都各自自由发展起来，去迎合这世界的时代精神。所取的趋向，虽是在世界的协同进化，所用的方法——就是进行的途径——却是都现出一种差别的形体。……全时代精神的进化，是社会进化的真意义。一民族适应全时代精神的进化，是社会进化部分的过程。离开了全时代的精神，便失却向上的反射力。^[101]

它包含了以下见解：1. 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严格的主义”，在马克思主义问世以前，它的学说和流派就很多，马克思主义问世以后，“许多社会主义的河流都流到‘马克思’这一个大湖水里面”，以致“有许多时候，好像说起社会主义，就是指马克思主义，讲马克思主义，就无异是说社会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也不可能统一社会主义学说和流派，相反，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各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又与“各民族历史的精神及现代境遇”相结合，造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分化”，在世界各国形成了多种不同的流派，客观上增加了社会主义的复杂性；2. 社会主义是“一个世界的时代精神”，是全世界各民族必然“所取的趋向”；3. 全世界各国各民族虽然必然走向社会主义，但由于“各有各的历史的精神，各有各的现在境遇”，所以各自走向社会主义“所用的方法”“进行的途径”，却必然呈现出“一种差别的形体”。^[102]戴季陶的第一点认识是历史与事实，第二三点是基于历史与事实的预测。从20世纪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发展看，一方面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在全世界蓬勃发展；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没有一个模式、也无须遵循一个模式已经成

为共识。戴季陶的这一预测无疑是符合历史发展事实的。

社会主义一语,有很多的解释……不细论,简单一句话说出他的普通概念来,就是反对现在经济组织的精神和运动。各家的学说虽有殊异,而于此点,却大抵相同。^[103]

这是李大钊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看法。这一看法一方面强调社会主义理论的纷繁复杂,另一方面点明了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与思潮的共同特点在于反对资本主义。

反抗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最醒目的特征。社会主义是一种彻底的民主主义,它反对任何“阶级主义”^[104]和“阶级的专制”^[105],不满足于劳动者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所获得的政治平等,要求把这种平等进一步扩大到经济领域,实现“产业的民主主义”,并把经济的民主看作是劳动者真正获得政治民主主义的前提和保障。^[106]《星期评论》揭露、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罪恶。戴季陶说:“以私有财产、自由竞争、工银制度三者为基础的现存社会,实足以戕贼人类社会良心,助长人类自利心的不健全发展。”^[107]李大钊指出,自新大陆发现、新航路开辟以后,世界日益成为一个整体,“欧洲诸国遂争相奋励其民以事拓殖,结果把欧洲内部的商业变成了世界的商业。”随着“实业渐次崛起,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基尔特制’(Guild System)已不能抵抗此世界的市场的势力而为工厂产业所压倒”。封建制的崩溃和“产业的大进步”,给人类“添了许多幸福”,同时也“添了很多的困难”。这困难就是“因为资本集中的结果,造成了大多数的阶级,使他们不能不受像机械一样为少数富豪所役使的痛苦;他们阶级的自觉,也渐发生了。结局社会上立起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阵营,演成阶级战争的局势”。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许多明智而且慈悲的人,不忍见社会上有这样悲惨的现象,乃想出好多救济这种社会的方法和学说,社会主义于是乎产生。”^[108]

在《星期评论》上,戴季陶等人考察了资本

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强调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戴季陶说:日本的资本主义“从明治初年发苗,中日战争后抽茎,日俄战争后含苞,这一次欧洲战争当中,乘着千载一时的好机会,万朵鲜花,一时齐发”,但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必然带来社会主义的兴起。日本社会现在好比是“绿叶成荫子满枝”,这绿叶、枝条就是资本主义,而子“就是‘社会主义的社会’”。^[109]戴季陶还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全球性的运动,只要存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制度,必定会发生社会主义运动,没有哪个地方哪个国家可以例外。“美国向来号称为产业乐土,宗巴尔特(即桑巴特——引者)教授从前也说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罢工的事件,越起越多;罢工的性质,越变越激烈。”日本“虽是一个产业的后进国,但是因为利用欧战期间,工业突然膨胀,贫富悬隔,突然加甚的结果,一向来专靠着资本家的温情主义过日子的工人,也都抬起头来。‘解放!改造!!’的声浪,透过大大小小几百次的罢工事件越冲越高,越响越远”。^[110]

综合李大钊和戴季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我们把《星期评论》对社会主义的基本认知概括为“反抗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时代精神与社会运动”。

由于社会主义是一个多重复合概念,加上本身的内涵很复杂,所以五四时期,使用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人很多,进行解释的人不多。笔者多方寻找,找到了1920年恽代英和冯自由的两个解释。

恽代英说,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因为倡导的人群众多、学派复杂的缘故,“本体便向来没有什么很精确的界说”。如果一定要“综括以叙社会主义应当的旨趣”,那就是“人类是共存的,社会是联带的,我们要求个人的幸福,必不可不求全人类的幸福”。这也正是社会主义学理上的根据。他把社会主义分为三派,“一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二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三社会主义的

社会主义。”他认为“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把“一切对于社会的设施,全然以国家利益为着眼”,实际上“只是一种国家主义”。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有两种:“一新村运动,一阶级革命运动”。前者“虽不纯然起原于寻求个人幸福的动机,但因为利己的本能得了个合宜孳生的场所,利他的本能因为遇不着适当的刺激,遂得不着适当的生长,所以精神每易太趋重了对内的完成,太疏忽了对外的发展。结果一部分的成功,无益于全世界的改造”。后者“只注意唤起劳动阶级与资本阶级的嫌怨,使劳动阶级为他个体的利益,联合,抗拒,奋斗”,也不是谋求社会长治久安之道。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应该是人人重视社会利益,“以求社会福利为目标”的“共存互助的社会主义”。^[111]

冯自由在其1920年4月出版的《社会主义与中国》一书中,对社会主义一词作出的界定与讨论如下:

什么叫做社会主义 Socialism? 这就是要拿世界上万般的事事物物,不平的使之平,不公的使之公的意思。……社会主义的心肠,乃是大慈大悲的心肠;社会主义的手段,乃是救苦救难的手段;在人道正义上看来是没有理由可以反抗的。然而人类本来是有一种自私自利的恶性,这种恶性,俄国人托尔斯泰 Tolstoy 称之为兽性。因为社会主义是反对不平及不公的主义,与怀有这种恶性的人类是不能相容的。^[112]

恽代英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偏重于人和社会的联系、互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主义一词原初的含义,而冯自由的论述,则突出了社会主义的正义性、正当性。

与恽代英和冯自由的认识相比较,可以很明显看出,《星期评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仅完整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正当性和正义性,而且凸显了社会主义一词的“时代性”——社会主义不是一般的追求公平正义的运动,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反抗资产阶级不合理政治和经济组织,维护

劳动者的合理权益,谋求实现社会和谐的运动。显然,就五四时期而言,《星期评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确实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是当时的佼佼者。

五、物质文明不高,不足阻社会主义之进行

社会主义是时代精神,是现代文明的产物,但这并不意味着古代文化中没有社会主义的思想因子。事实上,“建立一个消灭剥削制度,人人平等的社会理想,在世界许多民族中都是一个古老的理想。”^[113]在西方,有柏拉图的《理想国》,而在中国,则有“天下为公”的大同梦。五四时期,不少知识分子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现代性资源,以化解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紧张关系,为西方现代文化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做了一定的接榫、铺垫工作。

在《星期评论》上,戴季陶等人发掘了不少中国传统文化中社会主义的思想因子。

戴季陶认为社会主义是关怀“平民”的,反对“贫富贵贱苦乐不均的社会”,反对“黠武主义”,主张建立“平和的国家”与“幸福的社会”,是一种人道主义、和平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 and 价值取向。中国有着丰富的社会主义思想资源,“中国的思想,向来用一个‘仁’字做中心的”,^[114]“‘仁’就是‘人’,不用说也是人道主义。”^[115]有些人认为中国古代人的理想是“个人主义”或“家族主义”,戴季陶认为,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误读。因为“孝”“慈”虽然是“中国伦理上最紧要的事”,但儒家的大同的理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文主义关怀,则是“中国古代伦理的极致”。所以,“中国古代人的理想并不是‘个人主义’,并不是‘家族主义’,的确是‘社会主义’。”^[116]他还从中国古代的仁爱思想推衍出他的现代社会主义道德伦理原则。^[117]

戴季陶认为,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思想丰富多彩。在中国先秦时期,无论是“讲小国寡民的道家,讲‘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儒家”,还是“讲兼爱的墨氏”,他

们的学说中,都有不少契合社会主义思想的地方,都包含了不少社会主义思想因子。^[118]中国古代丰富多彩的社会思想不仅体现在老子、孔子、墨子等“哲学家的言论”中,而且在文学中也有很好的反映。《诗经》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学作品,社会主义思想“单是在《诗经》上面,可以看出来的,也不晓得有多少”。他还具体分析了白居易作品中的社会主义精神,认为白居易“虽不曾直接的描写出他理想社会”,但从他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卖炭翁》和《新丰折臂翁》,可以看出,他痛恨“当时那种贫富不齐贵贱不均穷兵黩武的国家和社会”,因此,白居易不仅是一个“平民的文学者”,也是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者”。^[119]

在《星期评论》上,蒋作宾指出:“佛家哲理高深,志愿宏大,无人无我,讲真自由,讲真平等,多合大同的主义。”^[120]佛教虽不是中国的本土宗教,但儒、释、道在中国古代社会基本上是三足鼎立的地位,因此,他这样说也是对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一种探讨。

戴季陶等人在《星期评论》上还多次对未来的理想社会进行了构想。

1919年6月15日,《星期评论》以“本社同人”的名义发表《关于民国建设方针的主张》,在其中的“主义”部分提出:“我们信奉民主主义为信条,主张废除一切用‘军国主义’‘阶级主义’做根据的制度和施政方针。凡是国家的种种建设,都要本于‘自由’、‘平等’、‘互助’的精神。促进文化,拥护人权,谋社会的均等幸福,图世界的永久和平。”这既是该刊建设新的中华民国的一个总指导方针,实际上也是该刊对未来理想社会的一个构想。

1919年8月,沈玄庐在《星期评论》第12号上提出了“物以下无人,人以上无人”的未来社会理想。所谓“物以下无人”,就是强调以人为本,关心每个人的幸福与发展,反对“以人为物”,反对有人利用权力、资本、知识等方面的优势,“把同类的人视为非同类的物”,加以“愚弄

欺凌”;“人以上无人”则意味着人人平等,没有人压迫人。^[121]

1919年10月,沈仲九在《星期评论》第21号提出了未来新社会的四个要素:自由的、公产的、共同的、科学的。所谓自由的,一是“自由组合……用大家的能力,谋大家的快乐”,二是“个人的地位,一律平等”,三是解除“种种政治、法律、宗教、习惯等强权性质的束缚”。所谓公产的,就是“要大家各尽所能,大家各取所需。劳动的结果,由劳动者公共享用”。所谓共同的,是指“凡是教养的、交通的、卫生的、娱乐的、衣食的各种机关,都是共同经营的”。所谓科学的,是指“利用自然物的质力,去替代人类的劳力,减少自然的障碍,增进身心的娱乐。”^[122]

1920年1月,蒋作宾在《星期评论》第31号指出,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世界的将来一定会从以前的“弱肉强食的主义”改换为“相互扶助的主义”,“国界是要废掉的,种界是要破除的,宗教界是要消灭的。”^[123]

戴季陶是《星期评论》上宣传社会主义思潮的中心人物,他两次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构想。在《星期评论》第5—7号,戴季陶翻译了英国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皮尔逊(Pearson)的《社会主义与两性问题》。在文章中,皮尔逊提出了社会主义的两个原则:(1)“人无论男女,只要不是肉体或精神不完全的人,如果不是用一种甚么形式,替社会服务,就不能有社会上一个人的‘道德权’”。^[124](2)“承认万人的劳动义务,同时也要求万人劳动机会的保障。”^[125]皮尔逊的这两个原则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劳动是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劳动光荣,劳动至上,不劳动者不得食。戴季陶结合皮尔逊对社会主义的认知,在1918年7月把社会主义的信条归纳为三大自由:“思想的自由”“劳动的自由”“性的自由”。^[126]1919年10—11月,他在《星期评论》第20、25号上发表《旧伦理的崩坏与新伦理的建设》一文,从马克思主义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基本观念出发,指出“伦理的规范,一定要合于

社会的生活,倘若社会的组织形体变化了,伦理的规范,也就随着变化。……到社会组织变异的时候,旧社会组织里面的伦理的规范,一定随着旧社会组织的形体,同时消灭;新伦理规范的要求,一定随着改造社会的要求,同时建设”。^[127]社会主义的伦理规范是建立在“公有”“共有”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之上的,它的伦理基础是“仁爱”——“爱公众就是爱我,爱我就是爱公众。”其目的是为了实现“个性的发展及社会的发展”,其手段是“共作——分工的协作;共养——老幼;共济——废疾死亡;共爱——性的自由;共乐——美术及运动;共治——全生产的分配。”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戴季陶扩展了这一思想,主张建立“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合全社会的力量养全社会的老”,“合全社会的力量,‘幼全社会的幼’”,“友爱全社会的兄弟”,“破除性的阶级和人格独占”,“撤废一切在自然的区域上的人为障壁”。^[128]显然,戴季陶构思的理想社会就是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国家,人人自由、平等、友爱、合作的社会。

综观《星期评论》上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不难发现,戴季陶等人在尊重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如人人平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共同劳动、自由发展等的同时,还非常肯定自由、民主、人权等资本主义时代所取得的人类文明的积极成果。

在《星期评论》上,戴季陶等人还提出了类似“物质文明不高,不足阻社会主义之进行”^[129]的思想,主张早在中国推行社会主义政策。

五四前后,中国还是一个资本主义非常落后的国家,“资本家之在中国,寥若晨星”。^[130]戴季陶等人认为,此时中国的“资本主义还未成熟”,中国的资本家“资本所有额很小,比起美国那样的资本家来,不过是九牛一毛”,但“不能因此便说中国应该要制造资本家”,^[131]静候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以后再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戴季陶等人的这一认识,包含的主要理由有:

(1) 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的大趋势。戴季陶指出社会主义是生产力发展和世界经济联系增强、走向一体化的必然结果。“随着交通范围的扩大,经济的关系,渐渐由国民的进而为世界的。”“全世界的经济组织已经联成不可分的关系。”“从前那种各国家对立的制度和少数资本家独占生产机关的制度,都同时发生破绽。由国家生出的破绽,就是世界主义的趋向。由资本主义生产制生出的破绽,就是社会主义的趋向。”^[132]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中应该顺应这种大趋势,积极吸收社会主义的精神,走社会改良主义的道路,避免将来出现阶级斗争和流血革命的惨剧,这样“不但是可以救国,并且可以作改造社会的先声,建设新文明的基础,在世界上增进中国人的人权,加高中国人的名誉”。^[133]

(2) 中国深受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之苦。戴季陶回顾近代中国的历史,沉痛地指出:“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民受欧洲强国和日本的武力主义及资本的帝国主义侵略的痛史!”^[134]在帝国主义的军事和经济侵略下,中国的“矿山、铁路、航权样样都被外国资本的势力垄断了去”,“中国人大多数都陷于‘世界的工奴’、‘世界的农奴’的境遇”,“这都是‘资本主义’的罪恶”。^[135]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导致了近代中国的民族灾难,所以,中国人民为着自己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必须要反对世界的资本主义。

(3) 中国的发展需要的是资本,不是资本家和资本主义。戴季陶指出,从手工生产走向大机器生产,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中国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我们中国国民生活受着外国大工业的压迫,如果我们自己不革除旧日的手工业,代以近代的大机器工业,只是购买外国的机器产品,中国人的生活,是要破产的。”但是,发展中国的实业,可以绕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国所缺乏的是“资本”“机器和运动机器的技术”,“并不是资本家”。中国如果有了“资本”,有了“机器和运动机器的技术”,把它和土地、人工、原料“合成起来,就可以做成近代的大机器工业来”,

没有必要“把上列几种东西,交给几个资本家,替他确立上一个所有权,再替他确立上一个身分权,把一切生产机关,都归他所有,才能做成功近代大机器工业。”^[136]

(4)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要特别重视经济平等问题。朱执信指出,“振兴实业,如果不注意在他分配一方面,决没有好结果。”从西方的历史看,随着大机器的使用、现代工业的发展,必然会出现机器排斥工人的现象,“本来是某一种工作可以用三个人做工,现在只用两个人;从前可以用两个人做工,现在只用一个人”。中国人口众多,劳动过剩,如果在发展实业的同时,不能解决劳动者的就业和生存问题,反而加增社会多余的劳动力,必然有相当一部分无业游民会因为生活所迫走上“做流氓土匪”的道路。所以,中国的实业发展要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新路,解决“没有工做的人的‘生存权’和‘劳动权’”。^[137]

戴季陶等人的上述思想,明显受到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影响。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也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在耳闻目睹了欧美和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导致的种种社会矛盾之后,他提出了“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138],直接从“中世纪的生产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139]的设想。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包含了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社会主义精神。在孙中山对中国经济建设的路线规划中,经济发展与经济平等同步进行,“一面要图工商业的发达,一面要图工人经济生活的安全幸福”,以便中国能未雨绸缪,免除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之后出现的贫富分化和“种种阶级冲突阶级竞争的苦恼”。^[140]《星期评论》的52个署名作者中,至少16人有追随孙中山革命的经历,戴季陶、朱执信、胡汉民、廖仲恺等人更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提供了思想基础。

戴季陶、朱执信等人在《星期评论》上的这些言说,与五四时期中国众多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着共通性,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分

子对社会主义的憧憬、向往和信赖,也是后来众多先进分子选择用社会主义救中国的缘由。^[141]这些思想有其积极性、合理性,但也有其偏颇之处,如:对资本主义作为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价值认识不够,对资本主义与现代文明的关系判断不清,对与资本主义相伴而行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日臻成熟的市场经济、商业文明、契约精神、法治意识、公民社会等现代文明因素的意义估量不够。

《星期评论》是五四时期“舆论界的明星”,该刊在积极传播新文化、新思潮的同时,把介绍和研究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办刊特色,成为五四时期重要的“社会主义论坛”之一。^[142]《星期评论》把社会主义看作时代精神,介绍的社会主义思潮种类繁多,有马克思主义、布尔塞维主义、无政府主义、珊地加利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I. W. W. 主义、互助主义等,希望通过比较、综合,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社会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戴季陶等人热烈欢迎社会主义,主张中国顺应世界大势,积极采用社会主义的原则和精神,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尽管《星期评论》只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一种,并没有给予特别的关注,其设想的未来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仍然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但在当时,它对中国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注释:

[1] 陈元:《“社会主义”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变迁研究(1899—1921)》,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1年。

[2] 曾长秋、柳礼泉主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3页。

[3] 如韩步善:《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阵地——评〈星期评论〉》,《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孙旭红:《〈觉悟〉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东方论坛》2014年第6期;孙建昌:《从辛亥到五四: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实践(思想理论版)》2021年第11期。有类似错误的学者颇多,在此仅举以上数例,不一列举。

[4] 陈力卫:《“主义”知多少》,周奇编:《传播视野与中国研

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15-139页。

[5]光佛：《注音字母那里去了？》，《星期评论》第22号，1919年11月2日。

[6]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

[7]包括马克思主义1次，马克思主义19次，马克司主义3次，马尔格时主义2次。

[8]包括满恰斯塔主义1次，满恰斯塔尔主义2次。

[9]包括阿那奇主义2次，安那其主义1次。

[10]包括布尔塞维主义7次，布尔色维克主义1次，波尔色维主义1次，布尔色维克主义3次，布尔色维主义3次，布尔色主义2次。

[11]包括北美珊地加利主义1次，北美的珊地加利主义1次。

[12]包括互助主义6次，互助的主义1次。

[13]包括产业民主主义1次，产业的民主主义6次。

[14]包括人类平等主义1次，人类的平等主义1次。

[15]包括I. W. W. 主义2次，I. W. W. 的主义3次。

[16]高放：《最早提出“社会主义”一词的德辛是何许人也》，《社会主义研究》1994年第3期。

[17]陈芳主编：《社会——旋转社会的万花筒》，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0页。

[18]汤玉其：《“社会主义”一词的若干考辨》，《教学与研究》1982年第2期。

[19]徐育苗主编：《科学社会主义疑难问题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7页。

[20][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从历史看社会主义的未来》，《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2期。

[21]朱国宏主编：《经济社会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01页。

[22]吴廷璆主编：《日本近代化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5页。

[23]曹旭华主编：《比较经济发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44页。

[24][苏]加尔别林主编，伊文成等译：《日本近代史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年，第292-301页。

[25]卢坦：《日本明治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6页。

[26]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08页。

[27]梁启超：《干涉与放任》，汤志钧、唐仁译编：《梁启超全集》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43-144页。

[28]孙中山：《复某人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28页。

[29]孙中山：《〈民报〉发刊词》，《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89页。

[30][33][39]杨奎松、董士伟：《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第56、192、193页。

[31][美]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序》，《震撼世界的十天》，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6页。

[32]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8页。

[34]周佛海：《实行社会主义与发展实业》，《新青年》第8卷第5号，1921年1月1日。

[35][36]舍梭霞里士姆1次。

[37]朱务善：《本校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之民意测验》，张允侯、殷叙彝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239页。

[38][112]冯自由：《社会主义与中国》，香港：大光报印刷部，1920年，第2、1-2页。

[40]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06页。

[41]陈独秀：《答褚葆衡（社会主义）》，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3页。

[42]季陶：《访孙先生的谈话——社会教育应该怎么做》，《星期评论》第3号，1919年6月22日。

[43][61][62][90][93][101][102]季陶：“世界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的适应”，《星期评论》第17号，1919年9月28日。

[44][48][103][108]李大钊：《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星期评论》第31号（新年号）第1张，1920年1月3日。

[45]汉俊：《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星期评论》第50号，1920年5月16日。

[46]季陶：《国际同盟和劳动问题》，《星期评论》第2号，1919年6月15日。

[47][53]沈玄庐、孙棣三、戴传贤：《本社给李纯的信》，《星期评论》第10号，1919年8月10日。

[49][54][82][83][92][德]威廉·里布列希著，季陶译、注：《马克思传》，《星期评论》第31号（新年号）第2张，1920年1月3日。

[50][63]汉俊：《劳动者与“国际运动”（上）》，《星期评论》第51号，1920年5月23日。

[51][89]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星期评论》第48号（劳动纪念号）第7张，1920年5月1日。

[52][57][60][100]季陶：《关于劳动问题的杂感（一）》，《星期评论》第48号（劳动纪念号）第4张，1920年5月1日。

[55][67]季陶：《学潮与革命》，《星期评论》第39号第2张，1920年2月29日。

[56][71][77][美]威廉·布里特著，季陶译、注：《劳农政府治下的俄国》，《星期评论》第39号第1张，1920年2月29日。

[58][64][69]仲九：《主义的研究与禁止》，《星期评论》第40号，1920年3月7日。

[59]云陵：《唯物史观的解释》，《星期评论》双十纪念号第1张，1919年10月10日。

[65][66][96][日]北泽新次郎著，汉俊译、注：《I. W. W.

概要》,《星期评论》第33号,1920年1月18日。

[68][70][105]季陶:《对付“布尔色维克”的方法》,《星期评论》第3号,1919年6月22日。

[72]颂西译:《俄罗斯社会党联邦苏域共和国新纪元两年的故事》,《星期评论》第49号,1920年5月9日。

[73][121]玄庐:《“人”与“物”》,《星期评论》第12号,1919年8月25日。

[74][132]季陶:《国家主义之破产与社会的革命》,《星期评论》第47号,1920年4月25日。

[75]季陶:《俄国的近况与联合国的对俄政策》,《星期评论》第26号,1919年11月30日。

[76][91]季陶:《社会民主化的英国政治》,《星期评论》第4号,1919年6月29日。

[78]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71页。

[79]杨匏安:《集产主义》,《杨匏安文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64页。

[80]唐钺、朱经农、高觉敷主编:《教育大辞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1233页。

[81]《新词拾零:集产主义》,《新中华》第3卷第10期,1935年5月25日。

[84]玄庐:《竞争与互助》,《星期评论》第6号,1919年7月13日。

[85][87][88]杨宏雨:《五四时期的互助思潮——以〈星期评论〉为中心的研究》,《学术界》2020年第11期。

[86]玄庐:《子孙主义》,《星期评论》第7号,1917年7月20日。

[94]季陶:《德国革命的因果》,《星期评论》第43号,1920年3月28日。

[95][106][日]森户辰南著,苏中译:《国际劳动问题的现势》,《星期评论》第48号(劳动纪念号)第5张,1920年5月1日。

[97]季陶:《英国的劳动组合》,《星期评论》双十纪念号第3张,1919年10月10日。

[98]《研究与批判》,《星期评论》第19号,1919年10月12日。

[99]徐苏中为克鲁泡特金的《国家论》所作的跋,附在《星期评论》第42号(1920年3月21日)《国家论(七)》之后。

[104]本社同人:《关于民国建设方针的主张》,《星期评论》第2号,1919年6月15日。

[107]季陶:《“萨波达举”的研究》,《星期评论》第34号第1张,1920年1月25日。

[109]季陶:《日本众议院解散的结果如何?》,《星期评论》第41号第1张,1920年3月14日。

[110]季陶:《新年告商界诸君》,《星期评论》第32号,1920年1月11日。

[111]恽代英:《论社会主义》,《少年中国》第2卷第5期,1920年11月15日。

[113]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66页。

学出版社,2000年,第66页。

[114][119]季陶:《白乐天的社会文学》,《星期评论》第4号,1919年6月29日。

[115]季陶:《人道主义》,《星期评论》第8号,1917年7月27日。

[116]季陶:《孝慈》,《星期评论》第10号,1919年8月10日。

[117][128]季陶:《旧伦理的崩坏与新伦理的建设(二)》,《星期评论》第25号,1919年11月23日。

[118]季陶:《可怜的“他”》,《星期评论》第14号,1919年9月7日。

[120][123]蒋作宾:《战后游历欧美的感想》,《星期评论》第31号(新年号)第5张,1920年1月3日。

[122]仲九:《我的人生观(下)》,《星期评论》第21号,1919年10月26日。

[124][英]皮尔逊著,季陶译:《社会主义与两性问题(上)》,《星期评论》第5号,1919年7月6日。

[125][英]皮尔逊著,季陶译:《社会主义与两性问题(中)》,《星期评论》第6号,1917年7月13日。

[126]季陶:《女子解放从那里做起(其六)》,《星期评论》第8号,1917年7月27日。

[127]季陶:《旧伦理的崩坏与新伦理的建设(上)》,《星期评论》第20号,1919年10月19日。

[129]《新民学会会议记录》,林代昭、潘国华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传入到传播》(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88页。

[130]孙中山:《实业计划》,《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97页。

[131][135][136]季陶:《劳动运动的发生及其归趣》,《星期评论》第41号第1张,1920年3月14日。

[133]季陶:《救国储金拿来做什么?》,《星期评论》第7号,1917年7月20日。

[134]季陶:《俄国劳农政府通告的真义》,《星期评论》第45号,1920年4月11日。

[137]执信:《没有工做的人的“生存权”和“劳动权”》,《星期评论》第37号,1920年2月15日。

[138]孙中山:《〈民报〉发刊辞》,《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89页。

[139]孙中山:《附:访问国际社会党执行局谈话的报道》,《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73页。

[140]季陶:《访孙先生的谈话——社会教育应该怎样做》,《星期评论》第3号,1919年6月22日。

[141]参阅杨宏雨:《二十世纪中国共产党人认识资本主义的历程及其启示》,《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142]本社同人:《〈星期评论〉刊行中止的宣言》,《星期评论》第53号,1920年6月6日。

[责任编辑:陶婷婷]